

讀段義孚《回家記》

要讀懂《回家記》（Coming Home to China），我們先要搞清楚段義孚（Yi-Fu Tuan）是誰。他不只是一位回鄉認祖的老人，他是人文地理學的泰斗，是將「情感」引入冰冷地理學科的開山祖師。

在二〇〇五年夏天，這位闊別故土六十四年的大師重返中國。這絕非一場溫情脈脈的尋根之旅，而是一次關於學術理論在殘酷現實衝擊下，如何受到挑戰的深刻反思。《回家記》這本書的價值，不在於記錄了一位遊子對故土的眷戀，而在於它無意間讓我們重新審視作者半個世紀以來構建的學術大廈。要理解這本書，我們不能僅將其視為遊記，而必須將其置於段義孚龐大的學術坐標系中。

早在七十年代，段義孚便以《戀地情結》（Topophilia）震驚學界，他定義了人類對環境的情感依附並非生物本能，而是一種審美建構；隨後他在《空間與地方》（Space and Place）中確立了著名的二元辯證：「空間」代表自由與廣闊，但也伴隨著威脅；「地方」則代表安全與價值，但也意味著束縛。

書中展現的，不是與故土的有機融合，而是一種持續的、焦慮的疏離。他在面對充滿煙火氣、城市聲音與高樓大廈時，頻繁感到窒息，中國繁榮的大都會哪還有什麼鄉土。他所熱愛的「中國」，始終是一個存在於唐詩宋詞中的審美對象。

這不是「葉落歸根」的圓滿敘事，段義孚留戀連鎖咖啡店，從他自己的人文地理學術語地理學系統，連鎖咖啡店是「無地方」性（Placelessness）的典型。然而對段義孚而言，標準化提供了安全感。落葉歸根有時是困難的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舊地早已在時間的長河中化為泡影。

回家記

作者：段義孚

出版社：上海譯文出版社

讀段義孚《回家記》

段義孚的鄉愁，帶著一種特殊的歷史重量。這不僅僅是因為他離開了國家六十四年，更因為他的獨特的身世。閱讀《回家記》，我們必須理解他身後的家族陰影，他的叔公是民國著名的軍閥領袖段祺瑞，他的父親是傑出的外交官段茂瀾。這種顯赫的家世意味著，段義孚記憶中的「故鄉」，是那個早已灰飛煙滅的二三十年代精英階層的中國。他這次回來，尋找的不是一個地理位置，而是試圖回到一個已經不存在的歷史時空。

這種身世背景，讓段義孚回鄉的努力顯得蒼涼。他的中文口語退化，他寫道：像是一支「好長時間沒用過的圓珠筆，必須要在紙上使勁劃一劃才能出油」。

他在《空間與地方》中提出「語言創造地方」，命名即是佔有。失去母語的段義孚，在中國的土地才強烈感覺到當中的失落，他在中國的大學演講需要依賴翻譯，這種「隔著玻璃」的體驗，精確對應了他自傳中提及的「玻璃衣櫃」狀態：看似透明在場，實則有無形的屏障。

段義孚對重慶與三峽的描寫也是有趣，他試圖尋找抗戰時期居住的重慶「歌樂山」舊址，那是他童年作為外交官之子的重要記憶，卻發現物理基礎已被現代化完全覆蓋。原有的泥土道路與舊式建築被水泥森林取代。他記憶中的重慶是潮濕、有機的；眼前的重慶卻是列車穿過大樓，垂直的多層奇觀。現代城市本質上是一種「失憶的建築」，依據效率邏輯重寫空間，與個人的體驗並不相關。

回家記

作者：段義孚

出版社：上海譯文出版社

176 《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》

《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》這本書最精髓的部分，在於它不是在教你背誦朝代更替，而是幫你重新畫了一張中國歷史的「骨架圖」。作者譚其驤作為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主編，展現了一代大師重構歷史格局的功力。

首先面對的是挑戰性命題：什麼是「中國」？譚先生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：歷史疆域是流動的。若用宋朝眼光，遼金是外國；用今天國界，部份清代割讓俄國的土地則成了異地。譚先生提出的標準：以清朝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至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鴉片戰爭以前的版圖，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圍。這是現代國際法進入前，自然形成的、版圖最大且有效統治的「極盛疆域」。書中寫道：「我們是現代人，我們不能以古人的『中國』為中國。」這提醒我們需站在今天高度包容過去的分裂。歷史上的中國是中華民族各族共同締造的，匈奴、突厥雖曾為敵，長時段看都是中華舞台上的主要角色。

解決了「我是誰」，書中提出歷史行政區劃的有趣觀點。譚先生指出歷史循環：地方政區總在「二級制」與「三級制」間擺盪。秦漢郡縣二級效率高但難管，於是派刺史監察，權力大了變州牧，就成了三級。書中判斷：「同一政區，通例都是越劃越多，越劃越小；到一定程度，它的級別就會降低。」這看透了官僚體制邏輯：中央怕割據就分而治之，管不過來就得在上面再設一級。「省」的來歷亦有趣，原是中央「行中書省」派出機構，不想走了便變地方政區。

在權力架構下，都城選擇重中之重。譚先生提出了「七大古都」概念，分別是西安、洛陽、南京、北京、開封、杭州、安陽。他對古都評價基於地理經濟考量，認為長安衰落不僅是氣數，更是糧食補給危機而來。北京崛起標誌政治中心向東部近海轉移，是軍事與經濟的平衡。這不僅是地理學，更是關於土地如何被組織統治的政治學。

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

作者：譚其驤

出版社：香港中和出版

雲夢澤與黃河的生態

讀譚其驥先生的書，最津津有味的部分，莫過於雲夢澤與黃河這兩個章節，是文學想像與地理現實的互通。

孟浩然名句：「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。」我們常以為那是浩渺巨湖。譚先生用考據告訴我們：這大半是文學想像。他釐清概念：「雲夢」不等於「雲夢澤」。先秦的「雲夢」是範圍極廣的楚王遊獵區，含山林原野。他引用證據：《左傳》記載令尹子文被棄於「夢中」由虎餵養。若是大湖早淹死了，所以「夢」是山林。真正的「雲夢澤」只是遊獵區南部的低窪地。而把洞庭湖算作雲夢澤，是延續千年的誤解。譚先生指出：雲夢澤在江北，洞庭湖在江南，涇渭分明。

雲夢澤的消亡，則是隨泥沙沉積，平原長高，湖泊變良田。宋代大澤已逝，變成了「百里荒」。這讓人感到繁華落盡的蒼涼。如果雲夢澤消失是滄海桑田。

作者拋出另一事實：黃河曾有八百年「安流期」。關鍵在中游黃土高原，在戰國前那裡是森林草原，黃河清。秦漢「移民實邊」變牧為農，破壞植被，導致河患。而東漢後的轉折，遊牧民族佔據中游「變農為牧」，耕地變回草原，植被恢復，黃河安流。譚先生寫道：「我以為這就是東漢一代黃河之所以能夠安流無事的真正原因所在。」

這段論述結合多維度，邏輯嚴密。雲夢澤被填平變良田，但失去了調節大湖；黃河中游開墾成糧倉，下游卻承受決口。譚先生觀點清晰：土地利用方式決定環境命運。這分明是在為今天生態建設提供借鑑。好書能穿透迷霧，讓我們看到被泥沙掩埋的真相。

譚其驥歷史地理十講

作者：譚其驥

出版社：香港中和出版

泥馬王堆地圖與上海的身世

1973年馬王堆漢墓地圖出土，是地圖史上的重大發現。譚先生比對發現，這幅兩千年前的地圖非常精確。山脈接近等高線，河流吻合現代。它還解決了歷史懸案：漢初長沙國南界在哪？地圖畫著「桂陽」縣治且無「南越」字樣，一錘定音，漢初桂陽在長沙國，邊界深入嶺南。譚先生感慨：「這幅圖的發現，根本推翻了古地圖制作粗陋的說法。」

譚先生對「文化」考證同樣犀利。他打破「統一中國文化」迷思，指出儒家未完全統治漢代精神世界。在漢代，燕趙之地「悲歌慷慨」，江南「信巫鬼」。他甚至引用史料指出，號稱「小鄒魯」的福建，當時盛行「溺嬰」、「好男色」等惡俗。儒生們自吹自擂，不過是閉目塞聽。這種敢於揭短的學術態度，實在讓人佩服。

上海名字怎樣來？他引用宋代稅收記錄，證明北宋熙寧前上海已是繁榮聚落，名為「上海浦」。他結合馬橋遺址等考古發現，推斷出四五千年前上海西部就已經有人類活動了。他計算出四至十二世紀，上海海岸線向東推進三十多公里。原因在於北方戰亂導致人口南遷，開發長江流域加劇水土流失帶來泥沙。明代以後，由於長江主航道擺動，浦東高橋一帶海岸線反而後退了。上海的變化，反映的正是滄海桑田。

譚其驥歷史地理十講

作者：譚其驥

出版社：香港中和出版